

# 教育家沈亦珍（上）

●費雲文（史學家，著有民國人物新傳，戴笠新傳等書）

## 謙虛沖和器度恢宏

我是江蘇高郵人，且談高郵的教育家沈亦珍

高郵文風很盛，教育人才也很多，近代最傑出的教育家，有輝煌成就，揚名海內外的名學人、教育家，有高明和沈亦珍兩位教授。高明以文學造詣精深，作育英才而望重士林。沈亦珍則以學貫中西、行政與教學兼擅，尤其對中等教育的貢獻，堪稱教育界的典範。他認為中等教育在整個教育制度上占一極重要的地位，所負使命非常重大。為了有效達成這一使命，他提出了許多對症下藥的辦法。曾經是他的學生後來又和他同事的郁漢良發表對他的觀感說：「沈老師畢生從事教育事業，逾六十年之久。他作育英才，桃李滿天下，真可說是『教不厭、學不倦』，實是教育界的典範。而沈老師的音容，可用孔老夫子的『溫而厲、威而不猛、恭而安』來描述，永遠使人懷念他。」

一般與他相處過的人，都能體會到：「他是一位博學鴻儒，為人謙虛沖和，器度恢宏，有休

休儒者之風。而其發揚中華文化，不遺餘力；忠貞愛國的高風亮節，尤足令人敬佩。」

## 母教賢明力學有成

沈亦珍家本是高郵的大族，世居北門外河邊沈家駁岸，數代同堂，堂名「深柳」。世代為宦，詩禮傳家。當他祖父逝世時，他的叔伯們，卻為爭分家產，不讓祖父入殮。他的母親出自名門，家庭富有，相當明理而堅強。毅然出面宣佈：「我三房絕不欲分得絲毫財產，喪事完畢後，立即遷出，我們一根竹筷也不帶走。今日先人不幸去世，焉能為了爭產，不使入殮？」

由於她的義憤辭嚴，才解決問題，後來他家庭因為她持家勤儉，並不以未分得祖產而感到拮据。可是獨得祖產的七房，卻日漸衰敗，財盡人亡。她又能不計前嫌，以她所生的第三個兒子承祀，為七房供奉牌位。並且對他們兄弟三人說：「七房過去雖然不識大體，但不可無後，吾家豈能不負此責？」

他父親早年即跟隨他的楊五表叔赴開封，擔任縣府幕僚，離家遙遠，當時交通不便，常常數

年不返。（前清末年，才回鄉擔任慶城小學校長），家中一切，全由他母親主持，除了家務，對他兄弟三人的教育，十分重視。先送私塾，後入小學，放學回來，不准外出嬉戲，晚飯後督促他們自修，功課做完才准睡覺。生活嚴肅而有規律，對他們交朋友，尤為注意，以防沾染不良習氣。每逢暑假，則事先選擇優良塾師，送他去研習中文，讀經書，練大小楷書，逐日交閱，日間有暇，尚需做點家事，用以養成勤勞習慣。

沈氏兄弟三人，他行二。長兄原名天祐，後來改為祇，字滌生，國立南京高等師範（中央大學的前身）畢業，歷任高郵縣立中學校長，教育局長及江蘇省教育廳督學等職，（是筆者的老師），三弟名祁，字筱宋，暨南大學畢業後，留學法國南錫（Nancy）大學，獲博士學位，歷任河南大學、齊魯大學、東北大學及暨南大學教授，弟兄三人，都在教育界服務，有良好的聲譽。

他原名天錫，改名禕，字亦珍（以字行），自幼聰穎好動，有冒險精神。讀「慶成」小學時（邑紳馬士杰創辦的私立小學），曾與年歲相彷彿的同學五人，仿效桃園三結義的意趣，結拜為

異姓弟兄（馬士杰的三子家駒，即為其中一人）。當時體育老師嘴形不正，能力也比較差，大家稱為「葛歪嘴」，不受歡迎。於是由十六歲以上年紀比較大的同學發起，大家齊赴東門外寶塔殺鴿為盟，以罷課手段，趕走葛歪嘴，（他也參加）。結果學校改聘在「致用學堂」任教的費石波先生兼任（筆者父親），才解決問題。他畢業於「慶成」小學時，才十三歲，他的父母對兒子的前途，有很明智的看法，認為：「既在小學畢業，必須循序漸進，才能成為有用之才，而家中雖然不愁溫飽，但並不富有，兒輩必須憑自己能力養活自己生命，靠自己奮鬥，創造自己的前途」。於是透過英文老師俞采丞的關係，送他和長兄二人去南京，升學鍾英中學。

### 南高港大優良學生

「鍾英中學」畢業後，長兄考取「南京高師」，他以為在校成績一向很好，就去投考「北京清華學校」及「上海南洋公學」，卻意外落榜，檢討之下，發現數理方面較差。他父母為了不讓他荒廢學業，就送他入「上海大同學院」讀書。「大同學院」是私立學校，由胡敦復創辦，特別注重制度的建立與師資的延聘。制度方面：「採取能力分組及選科制」。在入學之初，須參加考試，然後按成績及其自願學習的科別，指導選課。所選課程的高低，不必盡同，完全以適合個別需要為準。如某一學生，數理讀大學一年課程，英文則可讀高中課程，即為一例。師資方面，除由胡敦復校長兼授英文外，其餘國文、數理等科

都請名師任教，使他受益很大。他自己曾撰有回憶文稿說：

「余在大同學院為民國五年至民國六年，時間雖短，但對吾一生關係甚大。余在中學所受教育，為一種不平衡教育。除品格有優良之培養而外，對於知識教育，僅國文、英文獲益較多。入大同學院後，開始努力，不肯浪費光陰。對於數理課程，因得良師教導，基礎莫立。民國六年夏季考取國立南京高師工科，此後凡遇公開競爭考試，均能一帆風順，此皆大同學院教導之功。語云：（知恥近乎勇，失敗乃成功之母），信哉斯言。」他在「大同學院」一年，本不需轉學，但他父母以為讓他一人在上海，不大放心，仍希望他兄弟同在一校，相互照應。同時，他父親以為今後的社會必將轉向工業化發展，於是命他投考「國立南京高師」，以第七名優良成績錄取。他在「南京」不過一年，又於民國七年考取保送「香港大學」。僅僅一年，卻使他對「南京高師」留下深刻印象，他說：

「在南京僅一年，為時甚短，但一生做人做事，受「南京高師」之影響甚巨，南高校舍大、範圍廣，使余在不知不覺中胸襟為之開展。郭秉文先生之學識風度，以及辦事精神使余十分景佩，引為榜樣，南高學風淳樸，絕無奢靡浮躁之氣，對品格教育看得比知識教育更為重要。主持校政者雖多為留學生，然尚能把握我國傳統文化精神。今日之世，能超越南高者不多矣。」民國十一（一九二二）年夏天，他在「香港大學」以優等成績「畢業」，正好他的長兄沈滌生在廈門「集美

師範」任教，於是他也受聘前往，開始教育工作。

### 從事華僑教育工作

沈亦珍在「集美師範」任教僅半年，即於民國十二年應劉星舟的邀請赴「暨南中學」教書，「暨南」本是當年唯一的華僑教育學府，次年由南京遷往上海，他負責主持初中部，「暨南」改為國立大學後，將原有的初中與高中部合併成立附屬中學，他被邀擔任附中主任，從而開始教育行政工作。

「暨南」大學的學生，來自南洋及世界各地，尤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僑子弟最多。大都身體健康，好活動，性情真誠直爽；但也好衝動，易與人爭鬥，在南京時，就常在校外生事，予人不良印象。於是，學校將訓導處改為指導部，強調在訓導實施上，應著眼於指導。其指導要領有四：

- 一、負訓導責任者，須先從了解學生著手。
- 二、須從學生觀點而不從教師觀點看問題。
- 三、要幫助學生自己解決問題，而非處處由教師發號施令。
- 四、要輔導學生能自動自發，逐漸達成自我教育的目標。

他本此原則，大力推行，從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方面齊頭並進，學校訓育完全改觀，不但學生犯規之事減少，社會的觀感也為之改變。

一般人對於華僑教育有兩種不同的意見：一是應在國內單獨設立學校，教育華僑子弟，顯示

政府重視海外僑胞兒女的教育。二是不必單獨設立，應將招收的華僑子弟，分送國內各優良學校，使他們受到同化，既可收相同效果，也可以避免自以為特殊階級，甚至發生些不必要的問題。這兩個意見，仁智互見，難以論斷是非。他卻根據辦理的經驗，以為「中學華僑教育宜集中辦理，大學華僑教育，則不妨分散」。

### 立達學園崇高理想

民國十四年夏天，他接受周越然的邀請，任由于右任主辦的「上海大學」的英文系教席，並教授英國小說、理則學及西洋哲學史。同時，他也在「立達學園」任教。

「立達學園」在上海江灣淞滬火車站附近，為吳稚暉等所創立。不稱學校而稱「學園」。實有視學校為學習樂園的寓意。教師視自己如園丁，學生如花草。澆花施肥，剷除雜草，治理植物病蟲害，有時甚至需要剪折，工作繁雜，非人人得而為之。辦學者的抱負與方針，陳義相當高。

一、以立己立人，達己達人的方針，以自我為出發點，但不以自我為終極。還須有一種無我的精神，推己及人的態度，以實現大我。

二、教育既以人為本位，則造成的自我應為人的特色。立達的教育重點放在品德教育方面：培養理想與情操，具有高尚的道德觀念，充分實現人本主義。

三、重視人格感化，以人格影響人格，所謂身教。

四、主張愛的教育。視學校如家庭，教師如

家長，學生如子弟。學校管理重情不重法，對學生行為，不以校規約束，而處處動之以情，曉之以理。

五、強調民主主義教育的重要。教育的對象為個人，而個人的人格一律平等。接受教育的機會也一律平等。而使每人都可按其才能與興趣，能有自由發展的機會。

「立達」所主張的是理想主義教育，學校不設校長，行政由「行政委員會」共同負責。管理上提倡學生勞動，教室及宿舍內外清潔，均由學生自行負責。培養學生「自己事自己負責」的生活態度，學校不僅視教職員與學生為一體，對教工也是一樣；人格上一律平等。在餐廳裡，工友、學生與教職員同桌用餐，習以為常，不分階級。

（立達學園成立僅十三年，毀於抗日戰火）

他在「立達」任教，卻對「立達」的教育方針和實際做法，有一客觀的評鑒：

「立達教育有其理想，有其成就，應永遠在我國教育史上占有光輝的一頁。」

「惟是吾人應認清哲學與科學之不同功能及其相互為用之處。教育方針應從哲學著眼，教育方法則應從科學著手。」

「學校為一社會組織，既為組織，則其管理必須有一良好制度，才能產生效率。組織愈大，法制愈不可少。」

「立達全校人數最多不過二三百人，故人際關係尚屬密切。然今日之世，人人有受中等教育的權利，即高等教育亦已逐漸擴充，以應需求而達成民主主義教育的目標。任何思想有所見，往

往也有所蔽，豈獨立達教育思想為然？故如何運用理想主義與惟實主義，使二者揉合一起，發揮更大功能，誠不容忽視者也。」

### 辦學方針三大重點

民國十六年夏，當沈氏在上海大學任教時，適江蘇實行「大學區制」，將江蘇省教育行政組織改組，不設教育廳，而在中央大學區內設高等普通及社會教育處，分掌全省教育。他的友人歐元懷為「省立上海中學」校長，因為沈亦珍是江蘇人，又研習教育，遂約他到校任師範科主任。不久，歐元懷因為無法擺脫所創辦的「大夏大學」職務，辭去「上海中學」校長，由「大學區」改聘鄭通和為校長。積極從事校址遷建的工作，將校址由上海市區遷往縣區漕河涇吳家巷附近。舉凡籌措經費，招標興建，都能親自經理，只花了七個月時間，就遷建完成，並且校舍巍巍壯觀，設備新穎，使人大開眼界。

原任「上海中學」教務主任的李相勛就任「上海浦東中學」校長，由沈亦珍接任教務主任。鄭通和對他絕對信任，充份授權。於是，他以其豐富的辦學經驗，從教學上力加整頓，成效大著，自民國廿二年起，「上中」參加江蘇全省中學畢業會考，都是名列冠軍。

當「上中」校譽日隆時，每年暑假投考學生特別踴躍，錄取新生名額不過五百人，但大都有將近萬人應考，向隅者很多，當然這些人並非不可造就之才，棄之可惜。他與好友張慕聘、張克猷、孫繩祖、王肖坡等有鑒於此，為了為社會多

造就人才，於是於民國廿二年創辦私立「上海開明中學」，設校址於上海市，由張克猷等人及高郵同鄉孫雲選等人組成董事會，公推他為董事長，程克猷為校長。組織力求精簡，效率力求提高。

這是他自己創辦的第一所中等學校，他秉持一個新的理念他以為：

「論及中學之功能，簡言之，約有三端：一為統一之功能，二為分化之功能，三為指導之功能。任何一個民族國家，均需有共同之了解與情操，方能有共同思想、共同意志與共同行動。欲達成此一目的，在中學時期課程方面，應對普通文化陶冶予以注意。歐美中等教育莫不重視此點。」

「中等教育之分化功能亦甚重要，個別差異的科學上鐵的事實，無可否認。無論在生理與心理上，莫不如此。故現代教育對於適應個別需要異常重視，所謂分團教學（即能力分組），道爾頓制（Dalton Plan），皆以適應個別需要差異為學理上的依據。」

「中學教育之指導功能不可忽視。新教育與舊教育之重點不同。舊教育重權威，新教育重指導，教師不採命令態度，處處採指導方式。現代教育家有謂教育即指導，其故在此」。

因此，他的教育方針有三大重點：一為文理並重，二為中英並重，三為教訓並重。高中方面，為顧及個別差異及升學需要，由高二起分設文理兩組加強學習。另鑒於上海地區複雜，社會風氣不良，青年易受影響，乃特別強調品格教育的

重要。本此方針，努力前進。不數年校譽日隆，學生不獨深知品德之重要，注意品德修養；學業程度也日臻上乘。平時參加上海市中學學科比賽，往往名列前茅。（抗戰時學校停辦，並毀於砲火）

### 赴美深造締結良緣

民國廿二年，江蘇省政府，為了培養人才，特由教育廳舉辦全省教育工作人員考試，選送特優人員出國進修，為期兩年，每年只有一員名額。凡是在同一省學校任教滿七年的均有資格報名應考；同時並舉行留學生考試。

他自揣自民國十一年畢業於香港大學即在教育界服務，擔任學校行政工作多，教學工作少。常思有進修機會；一面增進學問，一面可對未來工作多作準備。於是決定應考。準備時間，只有短短的一個月，居然以極優異的成績錄取，與留學生考試錄取的李國柱等五人，公費赴美深造。

他本來已向美國伊利諾州厄班納伊諾大學申請入學，獲得允准。但因欲與李國柱同行，相互照應，臨時改變計劃，由李協助向密歇根州安阿巴密歇根大學（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chigan）申請入學，入教育學院，願以教育為終身事業。因為發榜，申請等手續需要時間，所以延到民國廿三年元旦才成行。

「密大」的生活多采多姿，密大的學生眾多，竟然占當地三萬人口的一半以上。其中中國留學生多過其他美國大學，大約三百人，男生比女生多。常有往來，男生有「兄弟會」（

Fraternity）的組織，女生也有「姊妹會」（Sorority）他也被介紹加入「蘭集」為會友。「密大」的中國留學生，出了不少知名人士：如吳大猷以成績優異不出三年即榮獲博士，而為學術泰斗，出掌「中央研究院」。王雋英在校即為校花，回國後當選立法委員，又為立法院院花，丁肇中研究物理學有新發現，榮獲諾貝爾獎金。

在密大期間，他卻有一件極大的喜事與收穫。那就是與來自中央大學畢業的李兆萱女士相結識。李是入密大研究院專攻經濟，結果結為夫婦，家庭幸福美滿，對他一生多所協助。

他在密大修業一年，得到碩士學位，即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繼續攻讀博士學位。第一學期按學校規定報名參加智力測驗，通過後，再參加綜合考試，用以測知應試者的教育基礎是否充足，他專攻的是中等教育行政，所以考的範圍一部份屬於中等教育，他又獲通過，然後準備博士論文，提出「中學聰穎兒童教育之研究」的論文題目。「哥大師範學院」教授陣容整齊，有很多名教授，同時也充份表現西洋大學教育的傳統精神：「學術自由」。不僅教授講學自由，學生學習也頗自由，不受任何束縛，在如此的氣氛之下，他憑著自信與努力，在短短的一年半時間內（比原來時間延長半年），通過獲得博士學位。並在論文中對兒童教育有精闢的見解：

「論及教育以兒童為重點，及以社會為重點之爭論，余以為兒童與社會並無排斥性。當然，教育之對象為兒童，從事教育者必須認識兒童。舉凡有關兒童之一切情況：如兒童之生理、心理

及家庭、環境各方面，均須有深切的了解，而後所施教育，方可見諸成效。」

「同時，吾人亦承認社會文化遺傳必須代代相傳，方不致中斷，教育對社會負有重大責任，無人可以否認。然而吾人不能認為兒童與社會乃兩個極端互不相容。任何人不能單獨存在，必須在社會中生活。相反言之，任何社會不能離開個人而存在，必須有個人方能結成社會。」

「因此吾人可以斷言個人與社會必須有調和發展，教育非專為個人，亦非專為社會，個人須貢獻一切為社會謀進步，社會亦必須盡其所能，使個人之天賦才能發展至最大限度。」

### 鎮江辦學甘肅從政

民國廿五年五月底，他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博士學位最後一次的口試，即整裝回到密歇根大學校園，與李兆蒼結婚。並先漫遊歐洲，然後回到中國，夫婦應聘入廣東勸勤大學，他執教教育學院，李執教商學院。江蘇省原有一所省立南京中學，設在南京花牌樓大街。但自南京列為特別市，直屬於中央行政院後，省立中學不能設在市內，遂於民國廿五年遷往江蘇省會鎮江的黃山近郊。首任校長王益崖因故辭職，教育廳遂徵調他接任。因為他之能夠赴美進修，是考取江蘇省官費保送。按規定，官費生回國，政府有徵調的權益，他也有應徵服務的義務。所以他就辭離勸勤大學的教職，去鎮江擔任校長。

鎮江中學是新建的，在郊外黃山，環境幽雅，為一理想的讀書地方。他於民國廿六年七月接

事後，對日抗戰已經開始，八月上海已成戰地。

他立即確定校務的三大方針：一為培養優良校風，二為提高學業水準，三為實行戰時生活。關於培養校風方面，首重優良秩序的建立，平時上課及課外生活皆須遵守規則，賞罰分明，積極與消極並重。並以班導師為訓育的骨幹。關於提高學業水準方面，則多鼓勵教師改進教學方法，增進教育效果。對學生嚴格錄取新生，規定各科課程，認真考查成績；並訂定「榮譽生」辦法，鼓勵學生上進。不數月，全校氣象大為改觀，行政主管機關及學生家長，對學校均有好評。而學生本身也處處表示愛護學校。至於實行戰時生活，主要目標在訓練學生的警覺性與敏捷性。並且特別注意日機空襲時的安全措施，雖說敵機經常經過上空，但並未肇成災禍。

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五日，因為上海淪陷，戰局不利，學校奉命解散。他在人心惶惶的大環境之下，力持鎮靜，計劃週詳的保持良好秩序的辦理各項事宜；按學生家鄉所在地，分為乘火車、乘船兩種，組織若干小隊，每一小隊均有教師護送到火車站或輪船碼頭，沿途照顧，學生無旅費的則由學校發給，解決問題，秩序井然。

他自己則與學校的事務主任胡頌淳在解散學校事務辦理完畢後，在萬分緊張與困難的情況下，由長江水路經武漢到達四川。先為「教師服務團」委員，旋即應聘去復旦大學任教，在文學院教授一二年級英文。並且設法促成他的夫人李兆蒼自她的家鄉江蘇南通，也來重慶，在復旦大學任女生指導兼授會計。

民國廿七年秋，他的老友鄭通和出任甘肅省教育廳長，請他前去襄助，擔任主任秘書，情不可卻。並且再約定他的老友也是高郵同鄉的孫雲遐同去，擔任中等教育科長，以及另一位老友滕仰支擔任社會教育科長。李兆蒼則仍暫時留重慶。甘肅教育原來頗為落後，全省教育經費每年只有法幣六十五萬元，各縣教育經費總共約一百卅餘萬元尚不及江蘇的十分之一，初等國民教育有小學四千餘所，學生十四萬人；中等教育有公私立中學十八所，師範學校九所，職業學校五所，學生五千餘人，高等教育只有甘肅學院一所，學生五十餘人。社會教育除有省立民衆教育館及圖書館各一所外，各縣有民衆教育館，共五十餘所。事實上因財政困難，經費不足，多屬有名無實，這以甘肅省廣大的轄土和衆多的人口以及抗戰時的重要性而言，誠為百廢待舉。

鄭通和做事一向有遠見、有計劃、有魄力，有毅力。過去主持上海中學遷校時，即已大顯才能。接任教育廳長後，在朱紹良、谷正倫兩位前任省主席的支持下，大展鴻猷。首先在經費方面，歷年增加，到民國卅一年已增為每年九百四十萬元，為接任時的七倍有餘。對於甘肅的教育，在沈亦珍的協助推行行政務下，從整體著眼，訂定：「甘肅教育進行計劃」，主要的下列各項：

(一)劃分學區：每區增設中等學校，按事實需要將全省分為十個中學及師範學校區，五個職業學校區，三年內次第完成。

(二)擴展初等教育：依據教育部令，於五年內，在每一鄉鎮設立一所中心國民小學，每一保設一

所國民小學。

(三)擴充原有高等教育機構：呈請教育部在甘肅設立大專學校。

(四)加強社會教育的發展：配合戰時需要，努力推行民衆補習教育。

(五)規定學校經費支配標準。除校長薪俸按學歷與經歷核定外；所有教職員工資，辦公費，購置設備費，均以每一班級的核算單位標準，並

刊登政府公報週知以矯正過去漫無標準的流弊。

在鄭通和的堅強領導和沈亦珍的竭力輔弼下，成效大著。到民國卅五年，每一鄉鎮都有中心國民小學，每一保都有國民小學。全省學齡兒童已入學的達到卅九萬八千餘人，佔整個學齡兒童的百分之五十四，中等教育，連同私立的共有一百卅八所學校，學生一萬六千餘人，比抗戰開始時增加五倍。高等教育，則一面商請中央在甘肅

設立大專學校；先後有國立西北技藝專科學校、國立西北師範學院、國立西北醫學專科學校、國立西北獸醫學院。一方面將省立甘肅學院，擴充為國立蘭州大學。社會教育，則把重點放在推行戰時民衆教育，並商請「中英庚款董事會」在蘭州設立「科學教育館」，民國卅年，再請中央在蘭州成立「國立西北圖書館」，以收輔導教育的實效。(下期續完)



① 沈亦珍教授的照片。

② 沈亦珍(前排中)早年與江蘇省立上海中學教職員合影。

員合影。

